

张玉春 主编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华文出版社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第十一集)

张玉春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张玉春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7

ISBN 7-5075-1730-6

I. 历… II. 张… III. 文化史—文献—中国—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08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665318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2.75 印张 32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6.00 元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建所二十周年誌庆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编委会

主 编 张玉春
编 委 汤开建 张其凡 程国赋
 范立舟 陆勇强 陈文源
执行编辑 郑可敏

弘扬传统文化

再造民族辉煌（前言）

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于1984年成立，今年迎来了建所20周年。20年来，在学校的领导下，在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与支持下，经历届所长与历任教师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从小到大，稳步发展，已成为全国高校中有影响的古籍整理研究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建所伊始，即服从于把暨南大学建设成为海内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近10年来，积极主动地贯彻暨南大学实施的“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立足内地，面向海外，面向港

澳台，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发掘古代典籍文献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之精华，探索结合侨校特色研究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得了显著成绩。

学科建设方面 为体现研究所的总体研究方向，我们设立了历史文献与文化、古典文献与文化、海外及港澳台地区文献与文化三个研究室，对中华传统文化展开全方位、多侧面的研究。经多年努力，各研究室已体现出鲜明的研究特色，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方面，宋元文献与文化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如宋代的《宋太宗》、《赵普评传》、《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元代的《元朝史》、《龙庭崇汗——元朝政治史研究》、《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等，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在古典文献与文化方面，对先唐文献的研究及文化阐释极具特色，如《中华文明实录》、《史记版本研究》、《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等；海外及港澳台文献与文化研究更是令学术界瞩目，先后出版了《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今日澳门》、《香港6000年：远古——1997》等，对香港、澳门的回归及稳定起到了作用。三个方面的研究既各有侧重，又密切相联，构成了本所的总体研究方向——依据古代文献典籍，阐述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在国内乃至海外有影

响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

研究生培养方面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所首任所长陈乐素先生便开始招收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此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所要发展，必须重视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培养高层次的研究生。在学校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又先后取得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与中文系联合培养古代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截止2004年，已有21名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35名毕业生取得硕士学位。毕业生中很多人已成为高校或研究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有一部分港澳毕业生，已在港澳特区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为贯彻中央的“一国两制”国策和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发挥着作用。目前，在校博士研究生40名，硕士研究生45名，已成为暨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本所现有专职教师15名，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8人，讲师2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10人，有博士学位的8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3人。教师均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学府，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素质，学术思

想活跃、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

研究成果方面 20年来出版学术专著58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49篇,获得国家社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48项,得到科研经费总额达92.4万元。人均出版科研成果、人均取得科研项目数均列暨南大学文科系、所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前列。

为了更好地体现暨南大学实施的“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积极主办各种国际及全国性学术会议,重视与国内外学术团体、学者的交流。20年来,我们曾协助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举办了“古代文史名著今译丛书研讨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研讨会”等有众多全国知名古文献专家参加的重要会议;举办了“陈垣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陈乐素先生百年诞辰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元史及宋元文化国际研讨会”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为了活跃暨南大学的学术氛围,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我所教师创建了“周一史学沙龙”,邀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俄罗斯东方研究院、越南社科研究中心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至目前为止,已举办了30余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贯彻暨南大学“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我们努力扩大在海外的

影响，拓宽向海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渠道，加强同世界各国汉学界的联系与交流。目前，已与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葡萄牙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扩大了本所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为了培养队伍，促进研究成果的公布，我们多方筹集资金，出版研究所的学术刊物——《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登载本所教师的论文，至今已出版十集。现在奉献在诸位学术同仁和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是《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的第十一集，也是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成立 20 周年的纪念文集，收录了本所教师和研究生的 22 篇学术论文。《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自出刊以来，国内及海外学术机构、学者纷纷求购，成为本所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交流的窗口。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走过了 20 年的风雨历程。20 年来，我们由建所初期的 5 人发展成为具有 15 名研究人员的精干队伍，图书资料 3.5 万余册，拥有复印机、电脑、数码相机、扫描仪等电教设备 10 余台，办公教学用房 251.8 平方米，随着学校办公条件的改善，本年底，我们的办公用房可增至 400 余平方米。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都离不开学校的正确领导与坚定支持。曾有一段时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很受重视，本所的发展也曾受到一定的影响，

甚至出现过“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是否有必要办下去”的疑问。学校领导高瞻远瞩，从学校的发展方向上把握，坚定支持本所的建设与发展，才使我们不断发展壮大。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人事处、研究生部、总务处等各职能部门也在研究项目立项与管理、科研编制与人才引进、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办公条件与科研设备等方面给予我们多方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全所教职工，向学校领导，向各职能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生逢盛世，长遇良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建立的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也是暨南大学蓬勃发展的20年。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在21世纪，崛起的中国将会更加强盛，中华文化将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在世界范围扩展。这是机遇，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迎来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这是挑战，在将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密切结合的课题上，还需要克服种种困难。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已开辟的方向，不断开拓进取，用我们的知识、智慧及对学术的孜孜追求，向海内外学子，向世界各民族展现博大精深而又绚丽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再造民族辉煌。

张玉春于暨南大学
2004年7月1日

目 录

弘扬传统文化 再造民族辉煌（前言）…………… 张玉春（1）

· 古典文献与文化研究 ·

龙门灵秀学殖空前富 文章旷代功业炳千秋

- 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因由…………… 张玉春（1）
- 《喻世明言》改编作品考述…………… 程国赋（12）
- 《全清词·顺康卷》辑补…………… 陆勇强（27）
- 入粤诗人佛隐和尚生平考述…………… 毛庆耆（58）
- 《水浒传》故事与金末红袄军史事对比勘同…………… 张 劲（73）
- 论《蔡宽夫诗话》的“历史”意识…………… 王 琳（81）

· 唐宋元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 ·

- 唐代节日漫议…………… 吴溢球（89）
- 两宋内丹道的发展与成熟…………… 范立舟（101）
- 宋代广东水利工程的大规模修建及对
粮食生产的推动…………… 郎国华（120）
- 王巩及其著作考述…………… 张其凡 李贵录（145）
- 赵雄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崔英超（175）
- 《心史》和郑思肖思想剖析…………… 王 颀（188）
- 关于《元典章》…………… 屈文军（205）

- 试论元代西北地区屯田 陈广恩 (218)
元代政治中的西域官员 马建春 (241)

· 明清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 ·

- 清代暹罗对中国的朝贡：1652—1852 ... 汤开建 田 渝 (270)
马夏尔尼使团访华与朝贡体制“保持
自主性”的实践 石元蒙 (313)
十九世纪香港的汉学研究
——兼论传教士们对香港汉学的贡献 叶 农 (333)
圣母圣心会呼和浩特传教述论
(1873—1949年) 张 彧 (347)
早期西方人眼里的广西社会
——伯来拉《中国见闻录》广西纪事 颜小华 (361)
浅谈《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洋传教士
之著作 吴 青 (372)
史学著作汉译的原则与方法 陈才俊 (381)

龙门灵秀学殖空前富 文章旷代功业炳千秋

——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因由

张玉春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所创作的《史记》，是一部史学、文学巨著，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史记》的诞生，与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人物，孕育出不朽著作，司马迁和《史记》正是西汉时代的产物。汉王朝建立后，汲取秦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使汉王朝的政权得以巩固。汉武帝继承并发扬文、景的业绩，将汉王朝推向了强盛统一的巅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广阔、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司马迁立足于现实，对历史发展进程作以集中概括，展现时代的精神和特点。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卓越学识、特殊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承家学少负不羁之才 习坟典初奠鸿儒之基

古老的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诞生了众多璀璨巨星般的杰出人物。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①，中华民族的文化巨匠司马迁就诞生于陕西韩城南、龙门山麓的芝川镇（西汉属左冯翊夏阳）。龙门山横跨黄河，奔腾的河水咆哮着将龙门山一分为二，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气势磅礴。龙门地理悠久，大禹疏通黄河，开凿龙门山，使其闻名遐迩^②。河水粼粼，鲤鱼腾跃，风光壮阔而神奇，陶冶了幼年司马迁的精神气质。司马迁的家世有着传统悠久的辉煌：先祖中或为文臣典周史，或为武将立功名。据司马迁的追述，其远祖是颛顼时代主掌天文地理的重、黎之后（此系传说），传至周朝，先祖程伯休甫为武将，任司马之职，遂以司马为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失其官职，司马家族自此之后“世掌周史”。直至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家族迁徙晋国，又移居于秦，公元前621年定居于龙门，为当地望族。其后三百年，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成为秦国的名将，因功官为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得力佐将，与白起共同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始皇的主铁官。三世祖司马无泽曾任汉市长（集市之长）。祖父司马喜官为五大夫。家学渊源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品格、志向的形成，使他自幼便萌发了发扬先祖传统，光大家族荣耀的抱负。而对司马迁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精心培养和所寄予的厚望，直接导致司马迁最终撰写出不朽的史学、文学巨著——《史记》。

司马谈生年不详，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他曾学天官（天文历法学）于唐都，受《易》（阴阳吉凶变化）于杨何，习道论（学术史）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前期

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文历法学和《易》学是史官必备的知识 and 职掌，而道论则是哲学观与学术史的结合。司马谈以其深厚的功底与渊博的学识，成为名重当时博古通今的渊博的学者。在武帝初年，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指》，创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名目，综合表达各种政治学术派别。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术史，它的贡献及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枋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鹭，自司马谈始也。……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③。司马谈评鹭诸家学术，不仅只是对先秦以来的政治学术派别作一总结，主要和实现他的夙愿有直接关系，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企图，至少可以说是潜意识的企图”^④。熔六家之长于一炉，效《春秋》而著《史记》，成一家之言，《论六家要指》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图。这种意图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史记》所体现的思想尽管与《论六家要指》的观点有所差别，但是可以说《论六家要指》是《史记》基本的理论指导思想。

司马谈禀承祖业，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他以修史为任为荣，效《春秋》而作史记，修撰一部淹贯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夙愿，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司马谈深知实现这项宏基伟业非一辈人所能完成，所以，从司马迁诞生于龙门，便开始对他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教育，期望自己的夙愿在司马迁的手中实现。他对司马迁进行的教育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司马迁讲述先祖“世典周史”的传统，灌输继承祖业的信念，强调史学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竭力培养司马迁对治史的兴趣。司马谈的谆谆教诲和司马迁长期的耳濡目染，司马谈的理想已在司马迁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

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修史立言的理想信念成为了司马迁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二是在学识上的培养教育。司马谈深知修成一部与孔子《春秋》相媲美的巨著,撰著者不但要有超凡的品德,而且还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他不是期望司马迁成为普通的史官,而是期望他成为继孔子以来最卓越的史学家、思想家。为此,司马谈为司马迁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制定了严格的教育方法,加之司马迁聪颖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所谓的古文,是指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文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小篆统一战国文字,使先秦文献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司马迁诞生之时,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已难能得见,更不用说诵读了。而熟读这些文献却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能在十岁“诵古文”,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超人的天资,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谈对他的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虽然“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但由于“司马氏世掌天官”,当然收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其他人无法具有的条件。在十岁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迁阅读了《诗》、《书》、《易》、《礼》等几乎所有古代典籍,又从司马谈系统学习了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为成长为一名学贯古今的史学、思想、文学界巨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展视野青年壮游 遵遗嘱入仕太史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经过家学的熏陶,饱读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文献